

天祿遺篇

吳璧雍

談院藏宋本晦庵先生文集

這是一部朱熹生前就被書坊編印出來的文集，見錄於《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原為晚明藏書家毛晉汲古閣所收藏。毛晉，常熟人，家產富饒，醉心藏書，好以高價收購宋本，當時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之諺語，此書應是嘉慶二年（一七九六）昭仁殿災後進入清宮，故卷首除有「毛晉」、「汲古主人」、「宋本」、「甲」等毛晉諸印記外，別鈐「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繼鑑」、「天祿琳琅」等璽印。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八月十七日，溥儀借賞溥傑之名，令其售於市，遂流落在外。抗戰初期，沈仲濤先生購於滬上，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捐增本院，為故宮宋本古籍失而復得留下佳話。

朱熹生平概述

朱熹字元晦，號晦庵，晚稱晦翁。生於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〇）。十四歲時，遵從父親遺命，師事父友胡原仲、劉致中、劉彥仲三人。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中進士第，任泉州同安主簿，聚徒講學，罷歸請祠，監潭州（今湖南長沙）南嶽廟。孝宗即位，上書力陳議和之誤國，與當道

不合，辭官歸鄉。淳熙五年（一一七八），史浩為相，薦為南康軍知事，次年赴任。任內特別倡導教育，重建白鹿洞書院，親自講學，訂立學規，為中國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寧宗繼立，奉召任煥章閣侍講，僅四十六日，即觸韓侂胄之忌而罷，從此歸鄉建陽，以講學著述終其生，慶元六年（一二〇〇）卒。（註一）

其一生重視儒學教育，實踐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主張；同時潛心著述，尤孜孜於儒家經典的詮釋，首將《論語》、《孟子》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合訂為《四書》，撰成《四書集注》一書，影響後世至深，為元代以後國家科舉考試必讀之書。其強調上下尊卑、長幼親疏的倫理主張，又





朱熹畫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成為元明清三代統治者維護國家封建秩序的內在精神支柱。

由於其學術的建構主要是從詮釋儒家經典而來，所以無論他是集北宋諸儒思想之大成，或是與當世學者如張南軒、呂東萊、陸象山等人交游論學，他所堅持的究竟還是在如何忠實的詮解原始經典；尤

其是和陸象山在江西的「鵝湖之會」，雖然各抒己見，互不相讓，但有意氣之爭，也有義理之爭，已成為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美談。

編刻時間的推測

朱熹為文長於說理，作詩不以格律、詞藻為重，此

本《晦庵先生文集》主要收錄其詩與文，分前後二集，《前集》十一卷，卷一、二為詩，卷三賦、策、銘、贊詞、歌等雜文，卷四解義，卷五表劄，卷六書答，七、八兩卷記文，卷九題跋、序及雜著，卷十墓誌銘，十一祭文。《後集》十八卷，一、二兩卷為序文，卷三至九標題《辯論》，實亦書答之文，卷十及十一問答，卷十二易贊，十三辯論，卷十四記，卷十五、十六行狀，卷十七碑銘，卷十八墓誌，似依體類而分，但看不出嚴謹的章法。由於兩集皆無序跋，不悉何人所編，但《前集》字體較端整秀麗，《後集》則筆畫稍嫌粗厲，結體不一致，顯然非同一時所雕。按昌彼得先生從本書避諱字考察，認為：「《前集》中遇玄、絃、眩、泓、殷、敬、警、貞、慎諸字缺末筆，而於光宗諱嫌惇、敦二字，雖書中重見迭出，但無一缺筆避忌者。《後集》除避玄、朗、殷、恆、貞、敬諸字外，於「敦」字避諱特為謹



《晦庵先生文集·前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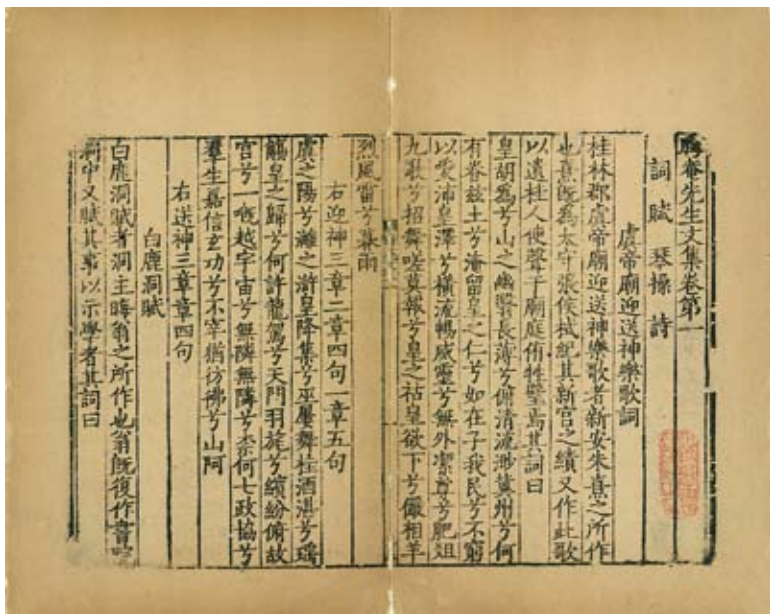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文集·後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嚴。由此推考之，則《前集》刻於孝宗時，而《後集》應刊於光宗即位以後。」〔註二〕此說基本上是正確的，不過《後集》「敦」字之避諱也非「特為謹嚴」，如卷五〈答吳晦叔四〉「令務敦朴」之「敦」、卷十五〈劉珙行狀〉「敦樸豪」、「敦教化」之「敦」

字，及卷十八〈黃侑墓誌〉中「不悖教化」之「悖」字皆未避，而卷十四〈周子通書後記〉，周敦頤之「敦」字則刻為「惇」，顯然並不很謹慎，而這正是書坊刻書的習性。昌先生另認為：「復考書中所錄之文，《前集》中應以〈西銘〉、〈太極圖〉兩篇解

義為最晚」，他的根據是朱熹〈題太極西銘解後〉所署「淳熙戊申（十五年，一一八八）二月己巳」，因為孝宗在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內禪，光宗即位，故認為《前集》應雕於淳熙十五年二月以後到十六年二月之間。但本書《前集》收〈西銘解義〉及〈太極圖解



《晦庵先生文集》 宋寧宗時期浙江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義》，並未收〈題太極西銘解後〉一文，如據《朱子語類》李性傳嘉熙二年（一一二三八）序所稱，〈西銘解〉和〈太極圖說解〉分別成於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和九年，^{〔註三〕}至淳熙十五年二月題〈太極西

銘解後》，已歷十五、六年之久，雖然朱熹自言：「余始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註四〕}可見〈西銘解〉和〈太極圖說解〉早已傳布於市。據今傳百卷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與楊教授書〉言及：「近聞婺源有人刻熹西銘等說」，雖然朱熹表示：「方此移書毀之」，^{〔註五〕}但實情如何令人懷疑。此書信按今人陳來於《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一書中認為作於淳熙六至七年之間（一一七九—一一八〇），^{〔註六〕}故所謂「《前集》應雕於淳熙十五年二月以後到十六年二月之間」，其實很難如此斷言，也有可能早在淳熙十五年之前就傳刻於市了。

按學者根據南宋閩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

文粹》（以下簡稱《文粹》）與《前集》比勘，發現《文粹》所收朱熹文，無論在編目或文字，皆與《前集》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以《文粹》書前載南徐許開紹熙元年八月序，及全書避諱至「敦」字和收錄諸文考訂，則《文粹》當作於光宗紹熙元年至五年之間，而且所錄朱熹文有部分來自《前集》。換言之，「《前集》在淳熙末不但已成書，而且已刊行」，並為他書所採錄，^{〔註七〕}此現象也旁證了《前集》之刻絕對早於淳熙末。

而《後集》的編刻，昌彼得先生以未收入淳熙十六年三月所撰之《中庸章句序》，而謂「《後集》的編刻應在淳熙十六年二月至三月之間」，^{〔註八〕}也未必然，畢竟未收之文並不獨《中庸章句序》而已。而且按「《文粹》所收朱熹之文均不見於《後集》，而《後集》所有之文《文粹》皆未收入。如果《後集》在淳熙十六年已成書，《文粹》為何只收

《前集》之文而不收《後集》之文？」再者，與今所通行百卷本比勘，其內文迥異者頗多，但部分卻又與宋人所編之其他文集全同，〔註九〕此當意味著《後集》成書在百卷本刊印之前。百卷本係朱子卒後其季子朱在所編，時約宋寧宗嘉定初，南宋晚期閩浙皆有刊刻，據當今學者比對，認為「二本詳略不同，編排有異，文字有別。一般來講，閩本多略，浙本皆詳。」〔註十〕可能也非朱在編輯原貌。本院藏浙刻本，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遇廓、擴等字皆缺末筆，為寧宗時刻本，而本書之《後集》，避光宗諱，不避寧宗諱，則刻於紹熙年間（一一九〇—一一九四）的可能性較大。

編輯內容的介紹

是書《前集》成編時應該沒有想到會編《後集》，所以只題「晦庵先生文集」，後來不知什麼緣故，也許是《前集》的銷售情況不錯，而且又

續得了一些朱熹文稿，於是再編一集，也許根本是分屬不同的書坊所刻，因為二集從字體來看大不相同。《前集》字體較方整嚴謹；《後集》的結體則嫌鬆散草率。就內容而言，兩集的編輯皆頗隨意，但還是各有特色，《前集》以詩詞歌賦、題記書跋、祭文墓誌等文學性較強的文章為多；《後集》則以論說性質的序文、辯論、問答為主，但題名仍做

「晦庵先生文集」，可見原為單行本。兩者的差別主要在版心，即《後集》除卷十五外，其餘各卷皆於下象鼻依次遞刻：「為、政、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又拱、定譬、眾、星、拱、之」等字，顯然非刻工名，而是取《論語》〈為政〉首章之文以記卷次，此在宋版書中極為罕見，視為不同書坊的不同思考亦無不可。

就外觀而言，《前集》漫漶葉較多，如目錄之首葉及八、九兩葉，卷三之首二葉、

卷六之首三葉，卷八之九、十兩葉及第十一葉之前五行，皆經抽換重刊；而《後集》目錄之六、七兩葉亦重刊抽換，字體均呈現建陽書坊特有的顏柳書風，並且多見簡筆字，尤其是《前集》目錄題名改稱「晦庵朱先生大全文集」，與他卷之題名完全不同，可見修補葉之刻還在《後集》之後，畢竟「大全」之稱係南宋末期始興而盛於元明。

值得注意的是，「前集」、「後集」之標注只見於總目錄，以及《前集》卷五之尾題作：「文集前卷第五」（此葉似補刻）和《後集》卷十五之首尾題名為「晦庵先生文集卷第十五」，其餘皆作「晦庵先生文集卷第幾」。另從版心來看，《前集》皆題「文幾（卷）」，《後集》始出現「朱文幾」或「朱文后幾（卷）」，而《前集》總目首葉題：「晦庵朱先生大全文集目錄前集（前集二字墨圍白字）」係補刻葉，並非原刊，



《前集》目錄首葉為元明以後補刻，書名與原刊不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元明以後補刊之《前集》卷三首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所以可推測，其分前後兩集本非原刻之意，而是前十一卷雕梓之後，當再輯刻另一文集時，始將兩書合為一帙，於是

有前後集之分。

按朱子著作在其生前已有書坊盜版圖利，此事前人多已提及。^{〔註十二〕}朱子卒後，其文

由季子朱在編輯，凡一百卷，南宋時閩浙皆有刊刻，浙刻本名《晦庵先生文集》，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皆有著錄，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遇廓、擴等字皆缺末筆，為寧宗以後所刻，本院收藏兩部。

其次為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建安書院刊本，題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韶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五曾著錄，此閩本於元明之後屢見重刊，成為通行之本，浙刻本則僅見宋刊。本院藏此前後集皆刻於朱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明嘉靖十一年福建按察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子生前，所載有百卷本所未收者，如《前集》卷四《西銘解義》、《太極圖解義》兩篇；卷六《與郭冲晦五幅》，百

卷本只收一幅，《後集》卷十《潘恭叔問心性說》、《潘恭叔問性命說》與《晦庵先生答》、《答王子合問詩諸說》

四章；又卷十二《河圖》、《洛書》及《八卦次序》等五圖。^{〔註十二〕}這些未載之文，如《河圖》、《洛書》後載入《周易本義》，其他則可能是朱在編輯後為刊刻者任意增刪，也可能是朱熹自行刪定或編入他書，無論如何，此秩為現存唯一刊於朱熹生前的文集，不但保存了若干今本未收之文，也保留較多書寫時的原貌，對研究朱熹思想者具有一定的文獻意義。

與百卷通行本的比較

比較本帙文本與百卷本（以《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十一年福建按察司刊本為校本）的異同，可看出原稿與無論是朱熹修訂稿還是書院增刪稿之間的差異。今以《前集》卷一之《古詩》題名相異者，舉十五首為例，如表一。

上舉之例只是十五首詩題，已可見百卷本修訂頗多，如做全面性的文本比對，則相異處也許更不勝其數。今

表一

前集卷一	百卷通行本
1 七月六日早發潭溪，夜登雲谷，翌日作此一首。	九月六日早發潭溪，夜登雲谷，翌日賦此。（編於卷六）
2 次韻范康侯一首	次季通韻贈范康侯。（編於卷四）
3 春江一首	宿石岳館二首。（此其一，編於卷十）
4 題武夷卜居一首	卜居。（編於卷四）
5 登蘆峯得白字一首	同丘子服游蘆峯，以嶺上多白雲，分韻賦詩得白字。（編於卷六）
6 游天湖得清字—山水含清輝為韻一首。	秋日同廖子晦、劉淳叟、方伯休、劉彥集登天湖，下飲泉石軒，以山水含清輝分韻賦詩得清字。（編於卷六）
7 登雲谷得冷字—雲臥衣裳冷為韻一首	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與子晦、純叟、伯休同發屏山，西登雲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北山來會，賦詩記事，以雲臥衣裳冷分韻賦詩得冷字。（編於卷六）
8 武夷泛舟得瑤字—相期拾瑤草為韻一首	游武夷以相期拾瑤草分韻賦詩得瑤字。（編於卷四）
9 平甫席上分韻得寫字一首	劉平甫席上分韻得寫字。（按百卷本分作二首，但於句末小注云：「此詩恐當作一首」，編於卷六。）
10 游畫寒分韻得竹字—茂林脩竹，清流激湍為韻一首	游畫寒以茂林脩竹，清流激湍分韻賦詩得竹。（編於卷六）
11 以梅花已判隔年開分韻得已字一首	歲晚燕集，以梅花已判隔年開分韻賦詩得已字。（編入卷二）
12 上巳修祀事飲于靈梵，以高閣一長望為韻得一字。	三月三日祀事畢，因修禊事于靈梵，以高閣一長望分韻賦詩得一字。（編入卷二）
13 步月詩一首。	讀子厚步月詩，時方聞呂伯恭訃，後數日賦此。（編於卷八）
14 武夷書堂十二詠	武夷精舍雜詠并序。（編於卷九）
15 游武夷書堂	奉同公濟諸兄自精舍集沖佑之歲寒軒，同邀諸羽客同飲，公濟有詩贈守元章師，因次其韻。（編於卷九）

將十五題名略作分析如下：
 1 《前集》的七月六日可能比較符合詩的內容，因「亭午息畏景，薄暮登危巒」句，有為避暑熱而晝伏夜出的意味。（註十三）2 題名百卷本較清楚明白；3 石岳在福州，古別名懷安，有石岳山，一分閩江為二，按現今學者考訂，認為此二詩皆寫於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春，朱熹訪福州時，一首寫去程走的陸路，一首寫回程由水路，（註十四）但是否真如所言，其實尚待深考。比較不可解的是，如二首寫於同一時候，《前集》為何只收一首，而且題名《春江》，並未言及石岳。4 《前集》較詳；5、12皆屬雅集賦詩之作，《前集》較簡略；13《步月詩》，百卷本加了一段小序，可因而推知賦詩的時間在淳熙八年（一一八一）秋八月。（註十五）14的《武夷書堂十二詠》可與15一併思考，亦即《前集》編刻時，書坊也許



《前集》〈武夷書堂十二詠〉於後世通行本已訂名為〈武夷精舍雜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並不知「武夷書堂」最後定名為「武夷精舍」，而且之後朱熹還寫了一篇〈武夷精舍雜詠序〉。按此序云：「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焉。」則「武夷精舍」之名訂於淳熙十年春夏之際，其〈雜詠序〉之成應較晚，或許比《前集》編刻時間晚，所以

《前集》未收，但到了編《後集》時，編者已將〈武夷精舍序〉收入卷二的〈通鑑紀事本末後序〉之後，且於文本中「為賦小詩十有二篇」句下加小注云：「詩載前集」，亦可證兩集之合秩係於《後集》編輯之時。

比較〈武夷書堂十二詠〉和〈武夷精舍雜詠〉十二篇，會發現除「鐵笛亭」外，前者部分詩前小序皆因有長篇的〈武夷精舍雜詠序〉之撰成而遭全數刪卻。如「觀善齋」題名下原注：「諸友所居，取相觀而善之義。」「寒栖館」下原注：「道流所居，取真詰寒栖道人之語。」「晚對亭」下有「面直大隱屏，取杜詩翠屏宜晚對」句；「茶竈」下注為：「水心巨石上有自然石鼎，四面水極深。」這些文句在百卷本中皆已不得見，但其文義都寫進後來的〈武夷精舍雜詠序〉一文中。換言之，當朱熹完成〈武夷精舍雜詠序〉之後，原來的詩序就沒有存在

的必要了。至於「鐵笛亭」詩之小序，在《前集》原載為：山前舊有奪秀亭，胡侍郎贈劉兼道云：「更煩橫鐵笛，吹與眾仙聽」，前日方尋故基，偶聞笛聲悲壯回聳，巖石皆震。追感舊事，欲復作亭以識其處，仍改名。

百卷本則修訂為：

山前舊有奪秀亭，故侍郎胡公明仲，嘗與山之隱者劉君兼道遊涉而賦詩焉。劉少豪勇，游俠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吹與眾仙聽」之句。亭今久廢，一日與客及道士數人尋其故趾，適有笛聲發於林外，悲壯回聳，巖石皆震。追感舊事，因復作亭以識其處，仍改今名。

又增加了不少說明，同時也可看出《前集》所稱的胡侍郎，到編纂百卷本時已作古了，故

稱「故侍郎胡公明仲」，胡明仲即胡寅，胡安國之子。本文因限於篇幅，只能略舉一二，但這樣的差異，已證實了朱熹經常對自己文章不斷做修訂的傳聞。

結語

朱熹一生致力於講學與著述，文學應酬之作並非主流，故其生前多以推廣儒家經典為主，所印皆為儒學相關著作，如乾道八年（一一七二）有《論孟精義》之刻，乾道九年（一一七三）印了《程氏遺書》、《程氏外書》、《上蔡語錄》，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出版《大學》、《中庸》，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刊行《小學》等。^{〔註十六〕}院藏此《文集》之刊行顯然未經朱熹同意，而是書坊擅自盜印以侷利者。由於刊行於朱熹生前，又未經朱熹修訂，或因而保留了較多朱熹文稿的原貌，這正是其價值所在。而且也因最後流入

清宮，成為「天祿琳琅」藏書的一員，得到較優厚的保護，所以雖為存世孤本，但書況頗佳，故本院於民國七十一年

（一九八二）付諸影印，也算為保存宋本古書盡一份心力。



註釋：

- 參見（元）托克托，《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朱熹列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88冊，頁36-49。
- 見昌彼得〈跋宋福建刻本晦庵先生文集〉一文，收入《增訂蟬菴群書題識》，（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297-301。
- 見《朱子語類》卷首「嘉熙戊戌李性傳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0冊，頁3。
- 〈題太極西銘解後〉，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葉十五。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嘉靖十一年福建按察司刊本。
- 同上註，卷二十六〈與楊教授書〉，葉四。
-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158。
- 參見郭齊、尹波〈台灣故宮博物院藏《晦庵先生文集》刊刻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六期（吉林，東北師範大學，1997），頁39-40。
- 同註2。
- 同註7，該文認為：「如卷十三〈皇極辯〉與今本文集所載文字迥異，而與宋人所編《性理群書句解》卷、《十先生奧論注後集》所載全同；卷十七〈少傅劉公神道碑〉與今本文集所載出入很大，卻與宋劉學裘所編《劉氏傳忠錄》卷二所收一字不差。這有力說明後集之文在嘉定初朱熹全集成書前曾為諸書探而成為別本。」頁40。
- 參見郭齊、尹波，〈宋刊閩浙二本《朱熹文集》關係考論〉，《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頁72-75。
- 參見昌彼得〈從書坊盜印風氣談宋建刻晦庵先生文集〉一文，收入《增訂蟬菴群書題識》，（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303-309。
- 今拜《四部叢刊》全文檢索之賜，見昌彼得文中所提今本未收之文如卷三〈復齋銘〉，並非未收，而是改題為〈復卦贊〉，編於卷八十五；〈憶秦娥—詠梅雪，長沙道中作〉，今本編於卷五，無詞牌名，但題〈雪梅二闕奉懷敬夫—二闕合次樂府，以有後詩仍舊編此〉；〈五禽言〉今本編於卷八；〈何叔京墓埋銘〉今本編於卷九十四，題〈知縣何公墳誌〉。
- 參考郭齊《朱熹詩詞編年考》，收入《朱熹新考》，（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頁191-192。
- 同上註，頁266。
- 同上註，頁222。
- 參考馬劉鳳、張加紅《朱熹與刻書》，《山東圖書館季刊》2005年第4期，頁8-10。